

# 浅议蒙藏凉州会谈及其历史意义

曾智娟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公元1247年,藏传佛教萨迦派法主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驻守西凉的阔端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谈。双方商定了吐蕃全境归属蒙古统治的具体条件,发表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从此,蒙古汗国在吐蕃派兵设治,奠定了西藏归于蒙古帝国统治的基础。

[关键词]萨迦班智达 阔端 凉州会谈《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由樊保良、水天长两教授主编的《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是系统全面地论述凉州会谈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第一本史学专著。之前,关于此专题的论著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即使在一些专著中出现过也只是寥寥数笔,点到即止。作为第一本论述凉州会谈的专著,其历史意义是不可否认的。正如孙英在代序中提到“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编写这样一本书,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它“填补了我国史学研究的一个空白,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做出了史学工作者的可贵贡献”。西藏历史问题研究历来是一个既敏感而又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凉州会谈”这一史实为此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材料。笔者在阅读此书时,心中颇多疑虑,尤其是如何正确评价“凉州会谈”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但笔者认为一些学者在对此历史事件的评价有欠妥之处。

## 一、凉州会谈的历史背景

任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必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时至13世纪30、40年代前后,蒙古统一天下已是大势所趋。13世纪初,我国蒙古北方草原上出现了一个内部团结,军事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政治势力——蒙古汗国。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发动第五次征西夏的战争,兵临今甘肃河西走廊及青海西宁、循化等地。1227年灭西夏。蒙古汗国在相继统一了西辽、西夏和金之后。统帅蒙古汗国西路军大将阔端奉父大汗镇守河西和攻取西藏之命,走马赴西凉府,为西凉王。1235年,蒙古兵分三路大举进攻南宋,西路军由阔端统领,进攻陇、蜀。蒙古军占领了吐蕃东北面的凤翔路、临洮路,东面的利州路、潼州府路和成都府路<sup>①</sup>,这样吐蕃就处于重兵压境的蒙古军包围中。因为在它的东南角只剩下一个小国大理政权,西面和南面是高山之外的南亚次大陆,而正北面早在成吉思汗降维吾尔,灭西夏时已与蒙古直接交界。蒙古人兵临西藏,吐蕃面临或战或降的选择。历史选择阔端与萨班作为会谈的双方也绝不是偶然的。此次会谈是时势使然,也符合蒙藏双方的根本利益。

阔端《新元史》卷 载:“阔端太子,太宗第三子,太宗七年分兵三道伐宋,阔端将大军由秦、巩入蜀”。窝阔台率军西征后,他是留在国内的皇子,战功赫赫,“乃马真皇后称制,阔端开府西凉”统治着原西夏故地。《秦边纪略》中说:“元封三

子阔端为永昌王,筑宫于凉北,即今之永昌堡也”。阔端既具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又有政治家的睿智。1239年,阔端派将领多达那波率一支蒙古骑兵进入西藏。这支军队从青海一路打到藏北。在拉萨北面,蒙古骑兵遭到寺院武装的小规模反抗,多达那波以武力攻占了热振寺,屠杀了数百名僧众,继而又烧毁了杰拉康寺。<sup>②</sup>此后,这支军队在拉萨一带驻留了近两年,未再与当地发生武装冲突。这期间,多达那波与僧俗上层频繁接触,了解卫藏地区的宗教政治情况。1841年,多达那波军队撤出西藏。原因史学界尚无定论。可能是多达那波继续驻守藏地遇到了困难,也可能是窝阔台病重,汗位的争夺和政局不稳,使阔端为了防止受到打击和削弱,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将兵调回。《元史》记载,这支军队撤出后,长期驻屯在甘、青一带。多达那波长期驻留藏地期间,在详细了解了西藏的政治、经济、宗教状况后,向阔端建议扶持一位能影响全藏的宗教领袖人物代理西藏事务,以教治藏,政教合一。并提出“在边远的藏区,僧伽集团以甘丹派(噶当派)为大,善顾情面以达隆法王为智,荣誉德望以积空、敬安大师为尊,通晓佛法以萨迦班智达为精。”<sup>③</sup>此时,阔端也意识到西藏地处偏远,气候寒冷,风土人情殊异,政教合一体制由来已久。因此只有扶植一位能统领全藏的教派法主,以教治藏。权衡再三,萨迦派法主萨迦班智达成为首选。

萨迦班智达原名贝丹顿珠,藏历第三饶迥<sup>④</sup>的水虎年(公元1182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后藏贵族昆氏家族。他天资聪颖,自幼师从伯父扎巴坚赞“尽学萨迦先祖所传口教精华甚深显密要旨”,并从受近事戒,取名贡噶坚赞。公元1204年,他师从在藏的克什米尔高僧释迦师利跋陀罗及其弟子释迦师利、苏克达师利、达那尺罗等学“《声明》、《量论》等五大明,学诗学、藻词等小五明”。他全学十明,得到精通,因而被尊称为“班智达”。公元1205年,又师从释迦师利受比丘戒。依照藏传佛教教徒的习惯,萨班取其师名的一部分,即以“师利跋陀罗”译为藏文“贝桑波”加在他名字的后面,称“贡噶坚赞贝桑波”。以后萨班又从释迦师利广学显密教法,声誉渐隆,并与佛教非佛教徒绰杰噶瓦等六人进行辩论,绰杰噶瓦等人承认失败,削发为僧,皈依佛法,做了萨班弟子,从此萨班“美声誉,遍于大地”。1216年,萨班接管了萨迦寺的管理权,成为萨迦第四祖。萨迦派发展到萨班时,已成为西藏地区一支

重要的力量,虽然在寺院数量上比不上噶当派,但是萨迦派直接控制当地政治、经济权利,其实力在卫藏地区首屈一指,是“政教合一”的一股重要割据势力。正是“政教合一”的这种一身兼二职的特的政治、经济权利,使萨迦派成为蒙古统治者羁縻笼络的对象,使之成为萨迦派与元朝建立联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面对蒙古大军压境,咄咄逼人之势,西藏各教派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宗教势力和经济利益,也在积极寻求政治上的靠山。萨迦派也比例外,作为萨迦派法主,萨班代表的是萨迦派,他积极回应阔端的诏请,于私,可以说是为萨迦派长远发展着想。如其所愿,凉州会谈之后,特别是在萨迦第五祖八思巴时期,萨迦派跃身为西藏第一大教派,统领着藏区宗教、政治、经济等一切事务。于公,萨班代表的是整个西藏。严峻的形势迫使张瞻高望远萨班意识到凉州一会,势在必行,于是他力排众议,统一认识,面对诘难,回答说:“我为何前往蒙古供施处?若不去的话,军队即来,若军队来此,就会给雪域西藏带来灾难。为饶益众生和牲畜,只好暂时前去,无有其他裨益。总之,为饶益众生,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萨班不仅目光长远,且颇具谋略,他在排除万难的过程中,对“凉州一行”大加宗教渲染。《萨迦世系史》记载,当喀且班钦·释迦师利离开西藏返回印度时,曾对萨迦班智达说:“白梵天神(《格萨尔王传》说是霍尔国的保护神)曾请求释迦师利前去蒙古向度母祈祷,度母对他说:‘你去蒙古没有益处,从西藏派一名弟子前去会有好处。’喇嘛杰尊钦波(即扎巴坚赞)圆寂前对法主(即萨迦班智达)说:‘在你的后半生,将有头戴飞鹰冠,脚穿猪皮靴,从说不同语言的国度前来迎请的使者出现,你将在没有听说过三宝之名的国度弘扬佛法,一定要前去。’”<sup>[9]</sup>

## 二、会谈经过

1244年,阔端遣使给萨班送去邀请信,。据《萨迦世系史》记载,诏书内容如下:“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晓谕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布。朕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在选择之时选中汝萨班,故望汝不此道路艰难前来。若是汝以年迈(而推辞),那么,往昔佛陀为众生而舍身无数,此又如何?汝是否欲与汝通晓之教法之誓言相违?吾今已将各地大权在握,如果吾指挥大军(前来),伤害众生,汝岂不惧乎?故今汝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管领西方众僧。

赏赐之物有:白银五大升,……。着多尔斯衮和本觉达尔玛二人赍送。”<sup>[10]</sup>

这封邀请信明显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出,阔端代表的是蒙古汗庭,而不是一地之王。这一点,萨班也心知肚明,不然也不会毅然赴约。信中,阔端既以权力想诱惑,又以武力相威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萨班接受阔端的邀请,与当年携两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从后藏萨迦寺出发,途经拉萨,前往凉州。到拉萨后,萨班并没有径去凉州,而是让两个侄子先去,自己则留下来同当地上层仔细磋商归附蒙古的大事。萨班在拉萨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他必须进行充分的

说服,协调好各教派的意见,达成一致的认识或取得地方实力派的通过才能赴凉州会谈。在征求广泛的意见后,他赶赴凉州。会谈中,萨班代表的是西藏地方,也是西藏方面迫于形势,为在困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而做出的选择。蒙古一统天下已是大势所趋,孤立中的西藏只有顺应这一潮流,凭外力来统一内部。1247年,阔端从和林到凉州,与萨班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晤。两人共同达成了西藏归顺蒙古的协议。阔端授权萨班代理西藏事务,萨迦派在蒙古的支持下取得了全藏的领导权。在此基础上,萨班奉命书写一封《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晓谕西藏僧俗各界归顺蒙古。

## 三“凉州会谈”的正确评价

关于凉州会谈的经过、性质和作用,学术界已多有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一部分学者,媒体对“凉州会谈”这一历史事件的作用进行不加思索的评论。

比如,称白塔寺是“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地”,称凉州会谈是“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开始”等等。这种论断割裂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因为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传统疆域内的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在凉州会谈之前,吐蕃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卫藏、康藏及安多藏区从来都是中国传统疆域的组成部分,无论他们曾处于哪个王朝及民族政权的统治下,因为王朝的历史并不等于中国的历史。方国瑜教授曾指出:“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过若干次的政治不统一,出现过几个政权同时存在,各自称国的情况,但是他们也还是在中国版图之内,同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sup>[11]</sup>对凉州会谈历史作用的评价也应遵循这一原则,肯定其对蒙藏关系的奠基作用,肯定其对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西藏的奠基作用,而不是盲目夸大。

文章结尾时,笔者想提出一个心中疑惑已久的问题,与诸方家商榷。王辅仁、陈庆英先生认为,蒙藏交往始于萨班与阔端于1247年在凉州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樊保良老先生则称萨班和阔端为蒙藏关系史上的两位拓荒者。据《萨迦世系史》记载:“在萨班到达凉州之前(即1247年之前),阔端身边已有一些吐蕃僧人。”可见蒙藏关系并非始于1247年,萨班亦非“蒙藏关系的拓荒者”。蒙藏关系究竟始于何年?由于笔者才疏学浅,未能得出最终结论。

## 参考文献:

- [1]樊保良《蒙藏关系史研究》[M],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 [2]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8页。
- [3]五世达赖·罗桑嘉措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7月版,第88-89页。
- [4]藏历以六十年为一饶迥,从公元1027年开始以饶迥纪年。
- [5]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中国藏学出版社,第22-23页。
- [6]阿旺·贡葛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注:《萨迦世系史》,中国藏学出版社,第89—90页。
- [7]方国瑜,林超民《方国瑜文集》(第一辑)[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页。

作者简介:曾智娟,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藏学。指导老师:切排,副教授,博士。